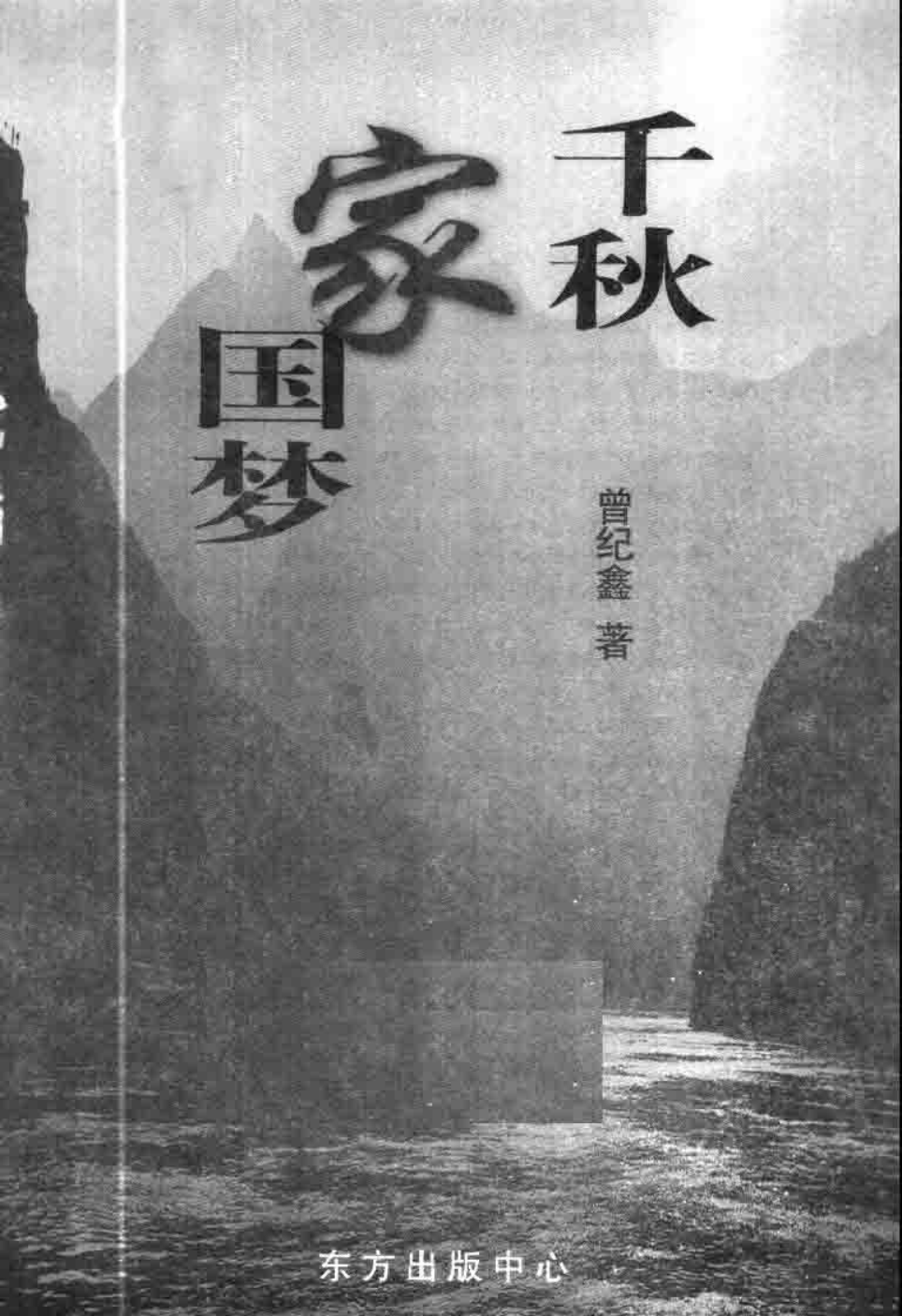




千秋 家 国梦

曾纪鑫 著

东方出版中心

走出古隆中



一部《三国演义》，对诸葛亮的描写几乎达到了完美无缺的程度。他不仅是智慧的化身，更是道德的楷模，集忠贞、信义、坚韧、谨慎、睿智、机敏、勤勉、清廉于一身。作者将自己心中的价值观念与理想追求寄托在他的身上，并对其外在形象也进行了一番精心的塑造，描写为手执羽扇、头戴纶巾、身披鹤氅，一副道骨仙风、飘逸潇洒的名士形象。

尽管《三国演义》有鲁迅所说的“状诸葛之多智而近似妖”之嫌，但对诸葛亮外表形象的设计与规范却相当准确到位。

据晋代裴启《语林》记载：“诸葛武侯与宣王在渭滨将战，宣王戎服莅事，使人视武侯——乘素舆、葛巾、毛扇，指麾三军，皆随其进止。宣王闻而叹曰：‘可谓名士矣！’”

诸葛亮的形象通过对手之口加以叙说，令人感到更加真实。

罗贯中正是以这些史料为依据，在《三国演义》中塑造了一个栩栩如生的独特形象。

诸葛亮具有千古不衰的动人魅力，除了智慧超人、道德坚

贞等内在的人格因素外，我以为与他的衣着打扮、名士“派头”等外在形象也有着极为重要的关联，一副自在自如、自然自信的飘逸洒脱与那些畏手畏脚、呆板迂腐的传统儒生形成鲜明对照。当我们打开漫漫的历史画卷，翻到三国那一页时，诸葛亮的形象便如一道神奇而夺目的光芒，突然闪耀在我们眼前，那发黄的长幅纸卷也因此而增添了几分亮色。

如果没有羽扇、纶巾、鹤氅这些富有象征意义的“行头”，诸葛亮再聪明、再智慧、再道德、再忠廉，恐怕也难以达到今日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的程度。

那么，诸葛亮何以形成了一副与传统儒生迥然有别的具有道骨仙风的名士形象？

这与他独特的人生追求与生活阅历相关，具体而言，是襄阳隆中十年隐居生活改造了他，塑造了他，从而结出了一颗神奇的果实。

诸葛亮受刘备三顾茅庐之礼聘而出山，那年正好二十七岁；非常巧合的是，二十七年后，诸葛亮北伐中原而卒，享年五十四岁。

因此，以诸葛亮走出隆中为界，我们可以将他的生命历程一分为二。

于个体生命而言，二十七岁的年龄，其生理、心理皆已进入成熟的季节。刚一成熟，就被刘备的“火眼金睛”看中而“摘取”。于是，一直被失意、失败的纠缠与追赶弄得疲于奔命的刘备从此奠定了鼎立三国的基础，由名不副实的“皇叔”摇身一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皇帝。而诸葛亮这颗掩映在万绿丛中的果子也似乎是为了刘备这位明主而悬挂在葱茏的枝头，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隐士成为一名光耀千秋的“天下第一相”。

走出古隆中，是诸葛亮经过一番认真权衡后的重大选择，一

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关键转折。

只有走出古隆中，诸葛亮的远大抱负与人生价值才得以实现，生命才以一种全新的形式步入灿烂与辉煌。

然而，如果没有古隆中的经历，没有一段不长不短、躬耕南阳的隐居生活，也就没有诸葛亮的闻达，那么，历史人物的长廊中将因此而少却一个熠熠闪光的独特形象。

是古隆中的自然环境与文化氛围，浸润了诸葛亮的心智，养育了他的才智，确立了他的品德，塑造了他的人格，成就了他的辉煌。

即使走出以后，诸葛亮的政治意识、军事行动、言行举止仍不知不觉地受着“隆中意识”的左右与影响。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诸葛亮的十年隆中生活，不仅决定了他的人生基础与政治生命，也决定了刘备、关羽、张飞、赵云等重要人物的命运走向以及蜀国的兴盛衰弱。

那么，且让我们随着诸葛亮的人生足迹，一步一步地走向襄阳，走进古隆中，看看这块风水宝地是怎样融于诸葛亮的血肉之中，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

二

诸葛亮并非生于襄阳，而是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县）人。他于东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年）生于一个地方官吏世家，兄弟姊妹五人，父亲时任太山郡丞。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比那贫苦百姓自然要强似百倍。

然而，灾难与不幸却像一把利剑残酷地刺向一个幸福而平静的家庭。诸葛亮约三岁时，母亲病故；八岁那年，又遭父丧。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只剩下了几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于是，叔父

诸葛玄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养育他们的重任。

诸葛亮十三岁那年，叔父诸葛玄被袁术任命为豫章(今江西南昌)太守。其时，兄长诸葛瑾已只身流亡江东投靠了孙权；叔父赶至江西赴任，诸葛亮兄妹四人只得离开山东，随叔父诸葛玄入赣。可不多久，汉朝廷却任命了朱皓为豫章新太守，以接替诸葛玄。

官职丢了，薪俸没了，一大群幼小的子女环绕膝下。怎样才能将他们哺育成人呢？被迫离任的诸葛玄茫然四顾，一时间仿佛陷入了走投无路的绝境。

突然，他想起了正占据荆州的刘表，过去，他们俩也算得上是一对好朋友。只是时过境迁，也不知今日做了荆州牧的刘表会如何对待自己。管不了那么多，活命要紧，只得厚着脸皮、拖儿带女地上荆州去走一遭了。

当时，荆州的治所不在荆州古城，而在襄阳。襄阳位于汉水和唐白河的交汇处，南拊江汉，西屏川陕，为南北水陆重要通道。于是，诸葛玄挈妇将雏，一路风尘仆仆地从江西赶往襄阳投奔刘表。

在诸葛亮一行到来之前，作为东汉末年颇有名望的“八俊”之一的刘表，已在刺史任上将荆州这块广袤而肥沃的地盘治理得有声有色。他不仅扫平了治所内的土豪武装，还与孙坚在襄阳打了一场史称“樊邓之战”的恶仗。素以骁勇闻名的孙坚在战斗中中箭身亡，刘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战后荆州，与烽火频频的其他地方相比，成了一块战争的缓冲地带，变得相对地平静起来。刘表奖励农桑，休养生息，吸引人才，“起立学校，博求儒术”，招来了大批关西、兖、豫学士，就连在豫东打了败仗的刘备，也投奔到刘表麾下。

就在这样一种良好的环境和氛围中，诸葛玄一行来到襄阳。

他们来得正是时候，自然受到了刘表的热情接纳。

于是，诸葛玄一家人、诸葛亮兄弟姊妹四人就在襄阳安顿下来，过了几年颇为安逸的日子。

这期间，诸葛亮进入刘表设立在城南二里之地的“学业堂”读书。尽管没有确凿的史料记载，但我们可以想见得到，儿时的诸葛亮，肯定受到了较为良好的启蒙教育，也就是说，在进入学业堂之前，已有了一定的知识基础。过着颠沛流离生活的诸葛亮根本没有想到还能进入正规学堂进行系统学习，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学习非常刻苦勤奋。

在此，我们有必要提及诸葛亮的学习内容。

学堂不是封闭的世外桃源，教育与政治、社会、时代息息相关。战国时诸子百家争鸣的自由活泼，已随六国的消亡变成后人常待追忆、向往的黄金盛世不再复归，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经过帝王的首肯与诏示，被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延及东汉，儒家经学更盛，成了士人们升官进爵的必由工具。据《后汉书》补注引《镇南碑》记载，当时的荆襄，已是“鸿生巨儒，朝夕讲论”，“古典毕集充于州闾”。由此可见，襄阳的儒学风气已相当浓厚。而诸葛亮的业师，即为当时荆州的儒学代表人物司马德操，一位功底颇深的古文经学家。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中，诸葛亮接受的只能是儒家教育。

当时的儒学，多少还具有一定的生命活力。统治者将它定于一尊，肯定有着一定的合理内涵。只是它被一代又一代统治者所利用，将它作为束缚自由、阉割人性的工具，才逐步走向教条化，变为一道约束中国知识分子的桎梏，成为名副其实的“儒教”。

儒学教育在诸葛亮身上打下的烙印相当深刻，他日后的人世进取、对刘备的忠贞不移、生活上的节制克欲等道德观念与行

为规范，都可视为此段学堂教育的结果。

好在诸葛亮在学业堂的时间不长，也更因为他有着远大的理想与抱负，这才没有被儒学束住手脚。否则，他极有可能成为一个皓首穷经、寻章摘句的酸儒。即使从最好的角度设想，大不了就是一名“鸿生巨儒”。即使巨儒也罢，没有多少发展创造，只会“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又有多大的意义与价值，对社会又能作出多大的贡献与付出呢？

一个看似偶然的事件发生作用，改变了诸葛亮的命运。

公元197年，也就是他进入学业堂后的第三年，叔父诸葛玄去世。此时的诸葛亮一定十分悲伤，三岁丧母、八岁丧父，跟着叔父东奔西走，饱经战乱、流荡之苦，一颗敏感的心灵无时无刻不在经受着痛苦的打磨。刚在襄阳过了三年较为稳定的生活，没想到自己一直依靠着的叔父又匆匆撒手人寰。命运于他，怎样这般冷酷无情？

叔父之死，比失去父亲更为伤心。毕竟，父亲亡时他不到八岁，还不甚懂事，不知道什么叫做悲伤；毕竟，这些年一直跟着叔父，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与谆谆不倦的教诲是他心头的温暖、寄托与支柱啊！

诸葛亮伏在叔父身上嚎啕大哭，他恨不得让自己汹涌的泪水将这充满了灾难与痛苦的人世彻底淹没。

在哀婉的哭声中，诸葛亮变得成熟起来。

叔父走了，失去了基本生活来源，他变得无依无靠，再也不能继续呆在学业堂就学读书了；自己已经十七岁，到了自主立立的年龄，应担负起自己的命运与未来才是。

十七岁，一个既自尊又脆弱的特殊年龄。

正是在这一年，诸葛亮决定不再寄人篱下，仰人鼻息，他要凭借自己的劳动与本事，过一种自食其力的全新生活。

于是，他毅然决然地离开襄阳城，来到了城西约二十六华里的隆中村。

襄阳，是他人生的一个中转站，是他进入古隆中的一道不可缺少的序幕。

只有进入隆中，一颗优良的种子才找到了合适的土壤，得到了充沛的水分与养分。

三

隆中山因一山“隆然冲起”而得名。

诸葛亮隐居的隆中村，坐落在隆中山南麓。

于隆中村的自然环境，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描写道：“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猿鹤相亲，松篁交翠。”也算得上山青水秀，风景优美，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矣。

当时，隆中属荆州南阳郡邓县管辖。沿隆中山东行，不到四里，即汉水南岸，乘船北渡，就是邓县县城。而从隆中到荆州治所襄阳，快马只需半个时辰，毛驴一个时辰，即使步行，二十多里路程，也要不了多长时间。

诸葛亮之所以选择隆中隐居，看中的正是它不近不远的地理位置。

他并不想做一名真正的隐士，而是潜伏静观，以待天时。如果遁入名山大川，隐入白云深处，过于远离尘嚣，就不能掌握人间信息，了解社会变革；若是太近，又不免流于浮华虚荣，达不到潜心隐志、冷静思索的目的。他之所以态度坚决地离开襄阳，我以为其叔父诸葛玄之死，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过是他找到的一个“借口”与“由头”而已，还有比这表象更为深层的内在原因。以

诸葛亮睿智、敏感的天资，他肯定不满于儒学的专制与禁锢，感受到了襄阳城内奢靡浮华、醉生梦死的嵬峨之风。

若是留恋襄阳的话，诸葛亮完全可以继续在那里生活下去。

但他要想使自己过得清醒一些，自由一些，深刻一些，便选择了隆中。

刚到襄阳不久，诸葛亮的大姐就经叔父作主，嫁给了蒯祺。蒯家是襄阳最有势力的大族之一，蒯祺曾任过房陵太守，家在今襄阳和宜城之间。不久，二姐又嫁给了当时最有声望的名士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辗转流落襄阳的姐弟四人，如今就剩下相依为命的兄弟两人。于是，诸葛亮携弟诸葛均一同走进了山青水秀的隆中村。

没想到这一住就是十年。

家境贫困，兄弟俩因陋就简，搭了一座草庐遮风蔽雨。好在这些年的艰难生活造就了兄弟俩吃苦耐劳的精神，他们并不以此为苦，反而充满了一种获得独立后的自信、自足与自乐。

隐居隆中后，诸葛亮做的事情主要有三件：白天躬耕陇亩，晚上挑灯夜读，闲暇之际拜会名士、结交朋友。

耕种收割对从未接触过农活劳作的诸葛亮来说，无疑是相当沉重的。在襄阳随便找点什么活儿干干都可糊嘴讨生活，为了磨炼自己造就自己，他的隐居隆中多少带有一点自我放逐的意味。“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诸葛亮肯定常常默念这背得滚瓜烂熟的孟子名言，以此激发、勉励自己。

是的，如果一点农活之苦都吃不消，还侈谈什么胸怀大志、成就大业呢？

在襄阳求学时，诸葛亮便常常“抱膝长啸”，对石广元、徐元直、孟公威等三名要好的学友说：“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

也。”三人反过来问他将来可做到什么官职，诸葛亮笑而不言。他为何不予正面回答？那一笑之中包含着什么内容？《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中为我们记载了答案：“（诸葛）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原来，诸葛亮的志向与抱负远大得很，他对一般的什么刺史、郡守并不感兴趣，要做，就做能够拯衰复兴、济世救民的像管仲、乐毅那样的辅相。当时，学友反问，他不好伤他们的自尊，只有含蓄地笑笑作答。诸葛亮是否真的具有廓清寰宇所需的经天纬地之才？一般之人，都表示怀疑，只有几位对他有着深刻了解的朋友才以为言之不虚。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不仅有着远大的理想，并对自己实现理想的才智充满了相当的自信。

农耕劳作磨炼了他的意志，强健了他的体魄，使他得以贴近大地，贴近自然，掌握中国农村的底层现状，了解广大民众的生活疾苦。这对他日后的惜民力、反奢侈、倡节俭、讲实际等品格和作风的形成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并且，他还在古朴聪慧的农民身上学到了许多在经卷上难以学到的知识，比如北伐中原时制作的木牛流马，很可能就是对当时农村的一种运输工具的改进，至少也与他在隆中时曾得到过某位能工巧匠的传授技艺与启发指点有关。

在隆中，诸葛亮对自己的要求相当严格，白天耕种，晚上则在一盏昏暗的油灯下捧卷阅读。

摇动、跳跃的光亮将诸葛亮本来就显得消瘦颇长的身影拉得更长，映照在泥糊的棚壁上，从这夸张而多少有点怪诞的影子身上，我们理解了《三国演义》中何以对他的描写带有一点“近似妖”的荒诞色彩，说到底，这只不过是对现实的一种折射反映

而已。

诸葛亮手捧一本发黄的经卷，一会儿认真地看着，一会儿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一会儿握管挥毫、笔走龙蛇地写下自己的独特认识与心得感受……灯光越来越暗，发出了“哗哗剥剥”的声响，他定睛一看，原来是灯芯结满了豆大的灯花。他只得放下经卷，挑去灯花，并将灯芯往外拨了拨。屋内顿时变得亮堂起来，就又如拾过书本，凑近油灯，再次进入了物我两忘的神游境界……

多少次，他就这样和衣伏在油灯旁不知不觉地睡了过去。

白天的劳作实在太累，晚上的阅读太认真了，刚入隆中，诸葛亮的隐居生活多少带有一种自虐的苛刻与严酷。

对此，诸葛亮曾著文道：“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他又说：“静以修身，俭以养性。”

入静去浮、精诚刻苦、脚踏实地、持之以恒，这就是诸葛亮端正的学习态度。就其学习方法而言，也显得与众不同，因他聪颖绝伦，常常一目十行，“独观其大略”，不搞繁琐的考证，不做寻章摘句的蠹虫，而能从总体上对历史、人物、学问予以把握。

这期间，诸葛亮的阅读视野已超越了儒家经典狭窄范围，广泛涉猎了很多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书籍，并对道家、墨家、法家、黄老、兵家、纵横家等诸子百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他在《论诸子》一文中写道：“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礼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在对诸子之得失进行一番审慎的分析后，他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充分地吸取百家的合理养分。

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当属道家与道教。道家以《老子》、《庄子》为立身经典，往往独自隐居在中国的穷乡僻壤之间，奉行人格独立、个性自由、顺应自然、生活俭朴等准则，其生活方式即

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道教则指形成于二世纪的一种宗教流派，其实践与经典所载往往有别，提倡静坐、炼丹，与独立遁世的道家实践相比较，更多的是依靠迷信和正规仪式，相信鬼神、画符念咒，具有等级森严的组织。

无论是道家还是道教，都在诸葛亮身上刻下了或深或浅的印痕。

诸葛亮在隆中身体力行的，正是道家所提倡、实践的那种生活方式。他的感受与体验，与老庄有着血脉相通的关系，因此，一旦道学进入他的视野，就如迷路的行人发现了一条畅通的归途。

诸葛亮真有一种回家的良好感觉。捧读道家经典，过着道家奉行的生活方式，结交的朋友也是当地知名的道学隐士如庞德公、黄承彦、司马徽等人。

公元200年，也就是诸葛亮隐居隆中三年后，“官渡之战”爆发，曹操以少胜多战胜袁绍，基本上统一了北方。于是，荆、益二州就成了曹操与孙权注目、争夺、吞并的焦点。政治、军事形势的急剧变化犹如涌动的春潮奔卷而来，猛烈地冲刷着襄阳大地。一批英才便在这独特而重要的政治环境中经受历史的锻打与磨炼，日渐塑造成形，除了最为突出的代表人物诸葛亮外，还有庞统、徐庶、孟建、石韬、庞山民、崔州平等一批杰出的风云人物。他们互相拜访，频繁交往，互通信息，集思广益，交换政治见解与思想心得，相互切磋，相互砥砺，相得益彰。

于是，除躬耕陇亩的剪影外，我们还看见了诸葛亮在隆中、襄阳及其他名士隐居的鱼梁州、白沙州等地或悠闲散步、或匆匆奔走、或策驴而行、或鞭马如风的多姿身影。

隆中，是诸葛亮潜心养志之地；襄阳，是他眺望中国、全局在胸的“桥头堡”；鱼梁州、白沙州等地，既是他求知的营养之源，也是他验证才华、砥砺思想、锤炼磨打的所在。

在诸葛亮交往、接触的隐士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当数庞德公。庞德公是诸葛亮二姐的公公，他在当地有着很高的威望与影响，可视为襄阳地区名士、隐士集团的自然首领。刘表曾多次请他出来做官，都遭拒绝。庞德公有“知人之鉴”，品评人物，颇具权威。他瞧不起儒生，认为他们不过是一些迂腐的庸才，而真正的有用之才是那些懂得时务的良才。诸葛亮尊重他，常到他的住所城东鱼梁州登门求教；庞德公深知诸葛亮，对他颇为器重。在概括、评价当地人才时，他称朋友司马德操为“水镜”，侄儿庞统为“凤雏”，诸葛亮则为“卧龙”。卧龙者——一条蓄精养锐、等待观望的真龙，时机一到，可就要腾空腾飞、遨游八极、搅动九州了。

在诸葛亮隐居隆中的日子里，值得一提的还有他的婚姻。对此，《襄阳记》曾有所记载：

黄承彦者，高爽开朗，为沔南名士，谓诸葛亮曰：“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发，而才甚相配。”孔明许，即载送之。时人以为笑乐，乡里为之谚曰：“莫作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

我们只要稍加分析，就会发现一些隐藏在这段文字背后的内涵。

黄承彦乃一有名有才之士，主动提出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诸葛亮，说明他相当看重佩服诸葛亮。黄承彦看中的不仅有他的才华，还有他远大的未来，更看中了他的德行，觉得他是一个可以托付之人。不然的话，他是不会随随便便将女儿许诺于人的。“丑女”一词，从黄承彦口中说出，我们还以为是自谦之词，但见后面所叙乡人对诸葛亮婚配的嘲笑，我们方知他娶的媳妇的确

是一丑女，恐怕还不是一般的丑呢，不然的话，时人就不会把“孔明择妇”作为告诫他人的一个典型例证了。

身高八尺、才有有貌的诸葛亮想娶一个漂亮的妻子并非难事，可他怎么娶了一个奇丑无比的女人为妻呢？于他来说，恐怕也是作了一番反复权衡的。黄承彦为沔南名士，与其女儿结婚可得到他的真心教诲与全力帮助；黄氏乃刘表后妻蔡氏、妻舅蔡瑁的外甥女，与她结成姻缘，不仅可与刘表攀亲，还可与襄阳豪族、当权派蔡瑁建立关系，可以奠定一定的社会基础；再则，黄氏虽不美，但“才堪相配”，得一贤内助，对自己日后功业将会大有帮助。

民间曾有传说，说黄承彦家藏传世兵书，诸葛亮意欲借阅。但黄家规定，兵书不能借与外人。为了读得兵书，诸葛亮只得与黄氏结为连理。而黄承彦，也就将祖传兵书作为女儿的嫁妆全数送与了诸葛亮。

历史分析与民间传说，两者互为印证，它们都说明了一点，诸葛亮之所以迎娶丑女黄氏，动机与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更好地充实自己以成就大业，实现远大的理想与抱负。

诸葛亮是一讲求实际之人，他注重的是藏在外表后面的实质性东西，深邃且远大的目光所凝聚的焦点唯有“未来”二字！

其实，在一个三宫六院、三妻四妾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妻子外表美不美并无多大关系。妻貌不美，自有其他途径补偿，不仅可以纳妾，还可寻花问柳。诸葛亮自然不会出入那藏污纳垢的烟花柳巷，但后来纳妾，却是不争的事实。

四

诸葛亮在隆中那块小小的地方一住就是十年，当我终于觉

得可以写写古隆中而安静地坐在书桌前将电脑敲得“噼啪”直响时，离游览襄阳隆中的日子已是七年有余了。

岁月如风，它吹去了浮华与轻荡，留下的是经过秋霜冬雪之后的成熟，这成熟有如一顆晶莹、沉淀的丰收之果。

一如诸葛亮的隐居隆中，如果没有这七年多时间的思索，我实在没有把握来写这篇《走出古隆中》。

当年游览隆中，当属“借光”之举。1991年春天，一个全国性的歌曲、舞蹈创作会议在襄阳召开，会议间隙，主办者拉着一车与会人员于一天午餐后去了隆中。欢歌笑语洒在专为游览修建的柏油马路上，一直洒向幽静的隆中，也不知吵醒诸葛亮的午睡没有。作为其中的一员，如果惊扰了他的美梦与宁静，我只有抱愧而已。

其实，我并不喜欢这种喧嚣的游览方式。一大群人挤在一起，热之闹之，什么都看了，又似乎什么都没看；来了去了，快疾如风，有时连走马观花都谈不上。最要命的是，你到了一处古幽之景，置身的仍是滚滚红尘，根本不能进入游览地的环境与氛围之中，也就全然没有独特的感受与体验，更不要说有什么深刻的思考了。

我惯常的游览方式，便是独自一人，身背行囊，寂寞地行走 在名山大川、名胜古迹之间。而我的内心，非但没有寂寞，反而时时涌动着一股奔腾的激动与昂扬。我沉浸在当时当地的气氛环境中，或独立思索，或与自然山水对话，或与圣人贤哲进行一场场充满睿智与机锋的辩论。我在这不断的思索、对话与辩论中获得了一种不可言喻的独特享受，而人，也就这样一点点、一步步地得以超越和升华。

夹在一群游人中尽管无法免俗，但我仍以惯常的方式进行着一种无望的挣扎。面对隆中幽静的山水，一个问题不知怎么

突然就跳进了我的脑海：当年，诸葛亮是否想到过幽静的隆中将因他的隐居而成为后人们的游览与凭吊之地呢？

我以为他不仅如此想过，这个念头还曾经在他的脑海里占据过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也是他能够潜心隐志、磨砺自我的重要精神支柱之一。正如一个将拳头收回后打出去更加有力的拳击手，诸葛亮的隐居隆中，并非要做一个真正的隐士，而是为了更好地“出山”。一旦出山，就是卧龙腾空，将像管仲、乐毅那样建功立业。于是乎，人们对他发迹之地的观光与仰慕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了。

与他日后所要驰骋的广阔天地相比，隆中的范围是那么狭小。十年的时间，就在这么一块小小的地盘活动，隆中于诸葛亮，就像一件穿了十个春夏秋冬都不曾脱下的衣衫，上面自然也要留下一些补丁。

一进隆中，迎面就是一座古朴雄伟的石牌坊，上刻“古隆中”三个大字。两旁石柱上，刻着“诗圣”杜甫的著名诗句：“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沿此处进入隆中，清幽雅致的景色中，与诸葛亮有关的遗址景点有躬耕田、抱膝亭、六角井、梁父岩、老龙洞、半月溪、小虹桥、三顾堂、草庐亭、武侯祠、野云庵等，它们与古隆中牌坊，共同构成了“隆中十二景”。

当我们的身影在隆中的这些遗址古迹间晃动、行走、凭吊、慨叹时，我分明感到一双无所不在的目光正灼灼投射在我的周围。抬眼上望，哦，原来是诸葛亮端坐隆中山顶，那超越千古的智慧之眼，似乎在默默地向我讲述着一个动人的历史故事。素有料事如神之称的诸葛亮即使当年，肯定就遥想到了隆中日后的发迹与兴盛，并设计了一些值得凭吊、具有文化价值的景点。如果上天有灵，当他见到一千七百多年以来，人们一直在他的思维与设计模式中转来转去的时候，将会作何感想呢？

据史书记载,诸葛亮出山不久,其弟诸葛均也离开隆中,做了一个长水校尉的小官。以后,一户姓董的人家在诸葛亮的草庐住过一段时间,随着这家人的相继死去,此地便无人居住了,显得更加幽静、寂寞,且有几分荒凉。直到公元 305 年,荆州刺史刘弘到诸葛亮故宅观光,触景生情,才命人作了一篇《祭诸葛丞相文》,刻于石碑之上立在隆中。五十年后,又有一位名叫习凿齿的荆州刺史别驾前来隆中祭奠,写了一篇《诸葛武侯宅铭》,刻碑立在诸葛亮故宅附近。此后,武侯祠也就依据石碑所立之处兴建起来,并围绕他留下的生活遗址修了一些相应的景点:汲水用过的水井砌个石栏杆,称为六角井;耕种过的田地叫做躬耕田;歇息过的岩石名为抱膝石;在一旁赏过月的小溪称做半月溪;刘备三顾茅庐时遇到黄承彦的小石桥叫做小虹桥;常站在上面吟诵《梁父吟》的岩石就叫梁父岩……明万历年间,荆南道观察使吴授又在隆中修造了三顾堂、古柏亭、野云庵等景观。

有兴便有衰,古隆中这块因诸葛孔明隐居而出名的土地,在历史的长河中,一如我们脚下的每一块土地,也免不了要经受一些兴衰的劫波与轮回。

古隆中曾遭到空前的破坏,诸葛武侯祠也几经变迁。其中有自然灾害如洪水的冲击与侵蚀,也有人为的破坏与毁弃。最大的一次人为破坏当数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袭封襄王的简王朱见淑觉得隆中景色绝佳,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便拆除有关纪念诸葛亮的古迹建筑,毁坏碑铭石刻,在山上建造自己的陵墓,并把隆中山改为座山。

一百五十多年后,李自成攻克襄阳,对明王朝恨之入骨的农民起义军不仅将藩王及其子孙杀得一个不剩,也将隆中襄简王的陵墓扫荡一空。玉石俱焚,古隆中变成了一堆废墟。

直到半个世纪后,郧襄观察使蒋兴芭在东山梁修复诸葛武